

西至南福建界

日本國圖

中外交通史籍叢刊

日本考

〔明〕李言恭 郝杰 編撰

汪向榮 嚴大中 校注

浙江

西

淮楊

山東

遼東

中華書局

西至北朝鮮國界

中 外 交 通 史 籍 叢 刊

日 本 考

〔明〕李言恭 郝 杰 編撰

汪向榮 嚴大中 校注

中 華 書 局

1983 年 · 北京

中外交通史籍叢刊

日 本 考

〔明〕李言恭 郝 杰 編撰

汪向榮 嚴大中 校注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$1/32 \cdot 9\frac{1}{2}$ 印張·140 千字

1983 年 5 月第 1 版 198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8,200 冊

統一書號：11018·169 定價：0.90 元

前 言

《日本考》是明代研究日本史籍中比較重要的一種，也是今天了解明代中日兩國關係史不可缺少的資料之一。三十年代，北平圖書館曾用萬曆刊本影印出版，列入《善本叢書》中。現在校註所據，即此影印本，原本中所有闕佚均仍舊。

謝國楨氏在《善本叢書》影印本《跋》中稱：“然記日本民物風俗、語言文字，則無逾是書之詳者也。”此或指其門類繁多，涉及範圍廣泛，而下之評語。其實明代記述日本書刊中優於是書者有之；即本書中民物風俗、語言文字之所述，亦均有其所本。但也不能否認有其獨創之處，足為時人取法的。時至今日，在研究明代中日關係史時，仍有其參考價值。

為使讀者在利用本書時，能知其背景並來自，特草《關於〈日本考〉》一文，供參考。

由於本書是數百年前所著，且本書所據資料，頗多來自江浙方面者；故書中用語不但與現在有別，且有不少為當時浙東方言。校註時所遇困難不少。我們不揣菲薄，力圖做到正確詳盡；但因能力有限，兼以資料圖籍一時難以收集；舛誤之處，在所不免。

稿成，得見日本渡邊三男氏《譯註日本考》一書，細讀之下得益良多；凡本書原註欠妥或不如渡邊註者，均加採納修正。

惟不敢苟同者仍多。特申明示不敢掠美，亦誌以供兩國學者共同探討。

註中對不敢確定之詞，一律存疑，不敢妄爲假定，因有“不詳”“待查”等語，請原諒。原書中所有小字夾註，今改排爲單行小五號字，外加括號。

本稿由嚴大中同志草註，最後由我校定修訂。校定過程中雖力求慎重，惟限於水平，仍多誤謬，盼不吝賜教，使能不斷改正，俾對學術界能有所貢獻。

汪 向 榮

一九八〇年五月

關於《日本考》

一

中國和日本，由於地理上相鄰，所以很早就有交通往來，見於文字記載的歷史，就有二千年之久。這二千年來，兩國之間通好往來，不但在文化技術上，有所交流，就在風俗習慣上，也相互影響。當然，在日本方面，由於有文字的記載較遲，所以天平^①時代以前的史事，難於稽考；但在中國却因為早有記載，所以歷歷可徵。前一段時間，可能祇見於官方正史；但到稍後一些，除了可以在史籍（不限於正史）中見到外，還有專門書籍出版了，特別是在明代以後。

古代中國對日本的研究，大體上可以分成四個時期：

1. 漢、魏時代；
2. 唐、宋時代；
3. 明；
4. 清（甲午以前）。

這四個不同時期的研究，都各有其特點。

前兩時期，即唐、宋以前，除了可以在正史中見到一些對日本的記載之外，絕少專門性的研究著作，或者可以說沒有研究著作可見，因此在談及這兩時期時，祇能以官撰正史作為代

（1）天平時代，指日本古代公元 729—794 年間的一段時期。

表。當然，官撰正史，也是有其一定代表性的，例如《三國志·魏書》中的《倭人傳》就很清楚地描述了三世紀以前，即彌生時代^①後期日本列島上的一些情況。這些記載，以近現代日本列島上相繼出土的遺物、遺跡相對照，絕大部份是正確的，相吻合的。因此，到現在為止，這一篇中國人最早研究日本的文字，不僅是研究中日交通史中唯一可據的資料，而且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僅有的文字資料。因為這樣，所以受到學術界的珍視。

到唐、宋時代，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技術的改進、發達，兩國之間的交通往來也有了很大的發展，遠非過去所能比。日本在那時不但派了不少解漢語、通漢文的使節、留學生和學問僧到中國，其中有些人在中國的居留時間還很長；而且由於中國文化的輸入和培育，日本也開始有了正式用文字記載的歷史。也因為當時來中國的日本人，多數都能通曉漢語、漢文，所以使接觸到他們的中國人，能通過這種共同的文字來溝通思想，了解意圖。因此，由這時期起，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和研究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，不單憑個別人的見聞和傳說，而可以直接得自來華的日本人士了。

這段時期內，除了極少數著作中提及日本人或事以外，關於日本的研究資料，主要還得依靠官撰正史。不過就在官撰正史的記述中，也可以見到當時已不僅僅了解到了日本列島上的一般情況，而且對某些特定的問題，也有了一定的興趣，開始加以研究和探討了。例如《宋史·日本國傳》中，就記載有歷代

① 彌生時代，指日本古代自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三世紀。

日本天皇的名字，並說其“乃世祚遐久，其臣亦繼襲不絕。”從這時候起，中國人才知道日本的皇室是“萬世一系”的。此外，也是由這時候開始，在中國的研究日本資料中，對日本列島上的地名，才有了比過去詳盡而具體的認識，不再是一個大概。不但這樣，連各地區的分郡和人口數字也都注意到了。可以說，隨着生產力的發展、時代的進步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，也有了根本性的變化。

唐代，一些文人的詩詞中已提到日本的人和事，如李白、包佶都有談及晁衡(阿倍仲麻呂)的詩，但是這些還不能稱為是對日本的研究。到宋代，雜史、筆記中已經可以見到一些能稱得上研究的文字了，像《鶴林玉露》中載有二十個日本語的發音，這是中國書籍中第一次見到的有關日本語言文字的記載。此外如《皇宋事實類苑》中談到了日本扇，歐陽修的長歌中提及日本刀等等，不過這樣零星的記載，畢竟還很少，因此還不能不以官撰正史作為根據。

入元以後，由於政治條件的變遷，加上生產力的不斷發展，交通技術日見進步，從而使兩國之間往來的人員、次數激增，彼此之間的理解也日益加深。這樣，中國方面有關日本的記載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，不再限於官撰正史了。正史的記載，不再也不可能代表這一階段中中國人對日本的研究、認識了。尤其是十六世紀以後，由於倭寇的侵擾，明朝政府官員及人民的抗倭自衛和歐風的東漸，世界變得接近，來往日益頻繁之後，相互間的研究也必然加強。因此，在元明以後，我們不但可以見到專門研究日本的書籍在數量上增加；就是在質的

方面，也遠勝於以往。所以在論及元明以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時，不能就以某一種，或某一類的書籍作代表，而必須綜合這一時期各方面的專門著作，才能全面地窺見其情況。

二

爲什麼明代對日本的研究特別盛，無論在質、在量上都遠勝於過去，甚而還多於稍後的清朝前葉呢？

有明一代，受到倭寇的騷擾，從時間而論，幾及整個明朝；而在空間，則又幾遍歷整個沿海地區。尤其是嘉靖以後，江浙沿海富庶之區，幾無一地不受倭寇侵襲、騷擾和蹂躪的；也幾乎沒有一處沒有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蹟。在這樣一種客觀條件下，要制勝和剿滅倭寇，就必須認識和了解日本，知己知彼才能取勝。特別是在軍事方面，取勝之道在於正確地判斷情況，而要能正確地判斷，沒有全面而充分的知識是不行的。在這樣一種背景和要求下，日本研究的興盛就沒有什麼奇怪了。

當然，這僅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。

我們知道，明代中葉以後，隨着生產力的不斷發展，資本主義的萌芽已開始露頭。明初鄭和的下西洋，其中就有爲日益增多的商品找尋海外市場的因素。日本雖然不是鄭和所要去的地方，但是對民間來說，尤其是對一海相隔的江浙人民來說，不但有歷史淵源，而且相距也近，當然是深感興趣的。這樣，要求掌握這樣一個有便利條件的市場——日本的情況，就日見迫切。而且當時這些地區往來於中日兩國間的人員、船舶也比過去為多。因此，在以上的種種情況下，元明以後，特別

是明朝中葉以後，對日本的研究，無論在質、在量方面，都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。

先從質的方面說，從這時期開始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，不再滿足於過去那一套，即耳聞的方式，開始要求親眼目睹。當然，還不能說已完全排除了道聽途說而來的欠實之詞，但必須注意到，當時身負對日外交重任的官員，如楊宜、胡宗憲之流，都曾派人到日本去了解過。這是一個大進步。這些被派去的人回國之後所寫的報告、著作，儘管其中也雜有不實之詞和道聽途說的傳聞之辭，但畢竟是脫離了舊的格式。這一點，不能不認為是其特色，替以後的日本研究開了端。

因為明代研究日本的著作，其撰寫者中，有些曾經到過日本；這些著作，是其親眼目睹的記載，所以其可信程度就較高。因此，當時將某些著作用來作為決策的參考，是有其理由的。明朝抗倭時，曾經擔任過指揮官的宋應昌，在其所著《經略復國要編》第十二卷的《與李臨淮侯書》中，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話，說：

“久因拮据戎事，致疎裁候，罪歎何如。然仰企故人
之私，即身寓玄菟，未嘗頃刻置也。昨辱飛翰下惠，兼惠
日本志籍，示彼出沒，資我運籌。具見門下留心國事，
感甚。”

收信人的李臨淮侯，就是《日本考》編撰者之一的李言恭。函中提到他送給宋應昌的日本志籍，可能就是這本《日本考》。函中所說此書能在他運籌時起到作用，從當時情況來看，恐怕也不是客套，而是有一定根據的。

明代一些研究日本的著作，大多數都是有所爲而作的，並不是爲研究而研究；其目的，主要就是供當政者決策運籌時作爲參考。從較早的《日本考略》開始都如此。

《日本考略》作於明嘉靖二年(1523)，書前有當時定海縣知縣鄭餘慶的序，序中明白的說：

“承乏定海，適遭其窮，以守城官兵併力拒守，蕞爾區壤，獨不罹害，幸亦多矣。”“以幸不可再，思患而預防之者，不可不密，乃命俊爲《日本考略》若干卷。”

這裏所謂他承乏定海時所遭的事，是指是年五月先到的日本貢使宗設和後來的瑞佐、宋素卿互爭真偽，發生兇鬪，追殺至紹興，沿途焚掠的事。鄭餘慶序中所說爲預防而使薛俊撰寫的這一點是真實的。因此薛俊在其自序中，很清楚地說明編撰之目的，在於“以便禦邊將士之忠於謀國者究覽。”

鄭若曾所撰的《日本圖纂》與《籌海圖編》，其目的更清楚，都是受命於當時負防倭重任的總督胡宗憲而作的，不僅其自序和茅坤在《刻籌海圖編序》中言之甚明，卽就兩書的編排體例上，也可以知道完全是爲了解倭情，以防倭患而撰的。

因爲當時的具體情況如此，所以《日本考》之被用來作爲運籌的參考和根據，把研究的成果用於實際，也是件理所當然，沒有什麼奇怪的事。

入清以後，由於客觀的情況又和明代不同，所以當時的一些著作，既不同於唐宋的，也有異於明代。這點以後有機會再論。

簡單的說，明代由於事實上的需要，特別是在中葉以後，

倭寇侵擾日甚，防倭抗倭就非先了解倭情不可，因此研究日本之風大盛；研究的方法，重視親眼目睹，偏重於實用方面。因為這樣，所以其成果能致用，並且還受到後人的重視。

三

有明一代，究竟有過多少研究日本的著作？其留下來的，又有多少？這問題很難回答，因為有很多著作，不但沒有留傳下來，甚而連書名、書目都不存，到現在已堙然無聞。有的又是一書二名，或同書而著者不同；有的存目無書，而又可能和其他存書而異名的是同書等等。要判別這些，有的比較容易，像《日本考》那樣，祇需將版本作一對比就可瞭然；但有的，却存在着很大困難，難以遽決。因此在這裏，祇能就一般所易於見到的明代研究日本的著作，作一大概的介紹。當然，遺漏和舛誤，在所不免。

下面根據我所見過的明代研究日本的著作，按其出書的順序，排列在下面。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嘉靖年間 | 薛俊：《日本考略》 |
| | 鄭若曾：《日本圖纂》 |
| | 鄭若曾：《籌海圖編》 ^① |
| 萬曆年間 | 李言恭、郝杰：《日本考》 |
| | 鄭舜功：《日本一鑑》 |
| | 侯繼高：《日本風土記》 |

① 《籌海圖編》編纂者嘉、隆版作鄭若曾，萬曆後則作胡宗憲輯議，《四庫總目》等因也作胡宗憲，實誤。

宋應昌：《經略復國要編》

天啟年間 茅元儀：《武備志》

存目的還有一些，如劉黃裳的《東征雜記》、王士琦：《封貢紀略》、楊伯珂：《東征客問》、熊尚文：《倭功始末》和不知撰者的《東封始末》、《東事記實》、《關白據倭始末》等等。

其中薛俊的《日本考略》成書較早，且為以後同類書所引據。但是如果細閱《日本考略》全書的內容，那麼就可以發現其牽涉面雖廣，但極簡單，而且大部份是摘錄舊史，加以分類排比；即和過去的研究日本史籍相類似，而不像以後研究日本的書籍，重於親眼目睹的事實。例如其中談到日本的風俗、制度時，仍照錄魏、隋諸史；在涉及州郡世紀時，則本於《宋史》。因此，其所述所錄，和成書當時日本情況頗不相符。難怪《四庫存目提要》謂其：

“見聞未廣，所輯沿革、疆域二略，略舉梗概，掛漏頗多。又序世系，但及宋雍熙以前，而不載元以後國王名號，亦疏漏也。”

這評語是對的，因為《日本考略》祇是集舊史之大成而加分類排比，所以沒有舊史可據的，就無法錄入。實際上自宋亡，元師寇日一直到嘉靖初，兩國之間的往來雖從未中斷，相當頻密，但是不是留有文字的記錄，則殊可疑。因此，薛俊受命編纂《日本考略》時，所能摘據的舊史中有關日本的記事，恐祇能止於宋代裔然那些部份。此外，《日本考略》中譌奪、脫漏、錯改及杜撰之處，亦復不少。因此，此書除在時間上較早外，不能認為是一本優秀的日本研究著作。不過也有一點是過去研究日本

著作所無，且爲後來開一模式的，就是《日本考略》中列有“寄語略”一欄，收有日語十五類三百五十八語，用漢字註釋。其來源，據薛俊自稱是“集其常談，類而輯之。”不過，在其前，已有火源潔的《日本館譯語》、楊振的《日本語》，《日本考略》中的寄語，是不是也是把這些書中所列的摘錄而加排比，因沒有見過這兩書，所以不能遽斷。不過就目前所知，類記日本語的中國書籍，恐以此書爲最早的了^①。

《日本圖纂》、《籌海圖編》，因爲其編撰的目的不同，所以要求和編撰方式也和一般相異。雖然說《日本圖纂》所據的還是《日本考略》，但已“持以詢諸使臣、降夷、通事、火長之屬，錯覈互訂，頗得其真。”並且還希望“俟後之天使，往而正之。”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。證之其中的《日本入寇圖》，自朝鮮迄於安南沿海各地，入寇路途都頗詳盡、正確。由當時的條件而論，可以稱得上是頗爲難得的。圖後所附的說明，在談到沿革和中國的關係方面都很簡略；以後的日本紀略則都是《日本考略》所無，再後的倭好、倭船、針經、貢式等也都非過去所見過的。不過其來源仍本諸傳聞，因此從實際價值而論，雖高於《日本考略》，但仍不能和以後他本人所撰的《籌海圖編》相提並論。

《籌海圖編》是在胡宗憲授命下，由當時在其幕中的鄭若曾利用督署中的材料，加以編輯而成。所以在內容上，廣泛而正確，可以說是集明代中葉記倭事大成的一部著作，不但在研

① 我所見的《日本考略》爲《得月蓂叢書》本和北京圖書館藏高麗刻本，其他未見過。

究方面，即在實際應用中，也是具有較高價值的，在明代 言及日本事情的著作中，本書是最值得重視的。因為性質的不同，以後有機會當詳加論述，在這裏就不多說了。

《日本一鑑》在明代研究 日本著作中，也是不可忽視的，以後將詳論。而《經略復國要編》和《武備志》，因為其編撰的目的不一樣，在性質上也和一般研究著作有別，所以在這裏也不擬論及。

四

這裏想着重的談一下《日本考》和《日本風土記》兩書。

《日本考》據《四庫全書總目·存目題要》（史部地理類）中的介紹是：

“《日本考》五卷

明李言恭、郝杰同撰。言恭字惟寅，岐陽 武靖王 文忠之裔，萬曆二年襲臨淮侯。杰字彥輔，蔚州人，嘉靖 丙辰進士，官至南京兵部尚書。方言恭督京營戎政時，杰為右都御史，會倭患方劇，乃共摭所聞為此書，記其山川地理及世次土風，而於字書譯語，臚載尤詳。後倭陷朝鮮，封貢議起，杰以力爭不合，徙南京。而言恭子宗城卒為石星所薦，充正使往封，至釜山而倭情中變，易服逃歸，被劾論戍。蓋徒恃紙上空言，宜不能悉知情偽也。”

《日本考》現在常見本，也就是我所見到的是三十年代初期北平圖書館影印的萬曆刊本，五卷二冊。開始署“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 京營戎政都察院右

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杰 考梓”，書考梓而不作編、撰或著、纂。一般是每半葉九行，但也有八行，七行的，行十八字。

考梓者之一的李言恭，《明史》卷一二六 李文忠傳後有附傳，極簡單，僅稱：

“子言恭嗣，守備南京，入督京營，累加少保。言恭，字惟寅，好學能詩，折節寒素。”

《提要》中稱他是萬曆二年襲侯的，但據《明史》卷一〇五功臣世表中，却稱是三年十月襲侯的。這條中對言恭履歷，談得較詳：

“言恭，萬曆三年十月甲午襲，四年中府僉事，加少傅；十四年二月戊寅總督京營，二十年庚午加少保，二十七年卒。”

有關李言恭的事迹大概就這些。《提要》中所說的言恭子宗城爲石星所薦，充正使，至釜山易服逃歸，被劾論戍的事是指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）四月，李宗城、楊方亨以正副使身份赴朝鮮，準備渡海與侵朝日軍談判，至釜山後因“倭來益衆，道路籍籍，言且刼二使”，宗城變服逃歸，而方亨渡海；以後豐臣秀吉拒和，方亨受辱，宗城逃歸後下獄論戍這一段歷史。

考梓者另一人的郝杰，《明史》卷二二一也有傳，而且頗詳。由傳中所述知他字彥輔，蔚州人，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舉進士，授行人，擢御史；隆慶元年（1567）擔任畿輔巡撫，後經陝西副使、山西左布政使，被劾，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道兵備，加山東按察使；萬曆十七年（1589）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遼東；後進右副都御史，正值日本軍侵陷朝鮮，旋遷兵部右侍郎，協理京營戎政，右都御史。以後因反對和議被徙南京，由戶部尚

書、工部尚書而兵部才卒於官的。

從兩人的經歷看來，在當時都是高級將領，雖然看不出他們有沒有像胡宗憲那樣擔任過直接和日本有關的工作，但從言恭子宗城被薦充任談判正使，郝杰因反對議和而被排擠等情況看來，他們對日本是有一定程度了解的。因此這樣一本研究日本事情的專門著作，由他們兩人署名考梓，在當時是有一定原因的。

上面提到過言恭是萬曆十四年二月總督京營戎政，而在二十年加少保的，而郝杰是在萬曆二十年七月以後協理戎政，到二十一年十月辛卯徙南京戶部尚書的。因此從其署名看來，《日本考》的上梓時期，應該是在萬曆二十年七月至次年十月之間，這樣才符合兩人所署的銜稱。而這一段時間正是：豐臣秀吉指揮下的日本軍侵襲朝鮮，明朝發兵助朝抗倭，不勝，朝廷間戰和兩派對立；以後李如松在碧蹄一敗，乃決心謀和。也就是說，正需要有關日本知識的時候，因此《日本考》和類似書刊的付梓出版，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。

這是有關《日本考》出版的背景。

據我所見到的和日本渡邊三男^①見到的，都認為《日本考》和《日本風土記》是同一本書，也即一書二刻；內容、版本完全相同，而書名、作者却完全相異。

兩書都是萬曆年間上梓、出版的研究日本的專門著作，現在發現竟是一書二刻，其間的關係又應該怎樣解釋、說明呢？

① 渡邊的書是昭和十八年（1943）出版的，可是我太陋聞，一直到最近才見到。